

YT 202/1002

富顺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九期

目 录

• 人 物 传 记 •

刘光第年谱(下).....刘海声(1—12)

• 历 史 人 物 •

伟大的统战风格.....张肩重(13—15)

——忆周恩来同志与青年党

· 领袖曾琦一席谈——

回忆三则.....杨汝纶(16—18)

宋令修和她的《裳华阁集》.....易奉倩(19—20)

• 江 阳 春 秋 •

匪烧板桥坝.....朱德芳(21—24)

一夜囚.....涂 璠(25—26)

• 民 族 · 宗 教 •

富顺的宗教(完).....刘仁德(27—31)

文史简讯(五则).....“文史委”编辑室(32—34)

编后记.....“文史委”编辑室(35—36)

一九八七年十二月

刘光第年谱（下）

刘海声

1894年（清光绪二十年甲午）三十五岁

这年，中国发生三件重大事件。一是公历6月，日本出兵侵略朝鲜，7月日军炮击沉中国租用的运兵英船“高升号”，一千多兵官兵壮烈牺牲，中日战争爆发。二是11月初，日军继续侵入东北7日不战而取大连。这天，慈禧太后却在为庆祝六十寿辰而大肆挥霍。国家政事，一概搁置不办。三是春，宋育仁持所撰《时务论》谒翁同和，光绪升文廷式为待诏学士，夏，命翁同和参与枢机，秋，命其为军机大臣。翁同和阅读康有为《新学伪经考》。光绪思有所作为。

春，赵熙二次赴京应朝考，授翰林院史馆编修。寓刘光第家，除谈诗论文外，兼论时事。曾在《日记》中写道：“谒裴村先生，论时事，慨然有人心世道之忧，而精神为之一振”。以后，赵熙还常偕徐子来、尹仲锡等拜访光第。

六月二十四日，生女荷生。

光第眼看“大局濒危，乱机已伏”，“满目时艰，种种难言”，“叔奸宦，深结太后，以致大势不可为”，十分愤慨，决心冒不测之祸，写了《祭昧》。内容共有四点：一要求慈禧太后“颐养天和，宁神懿志”，不要让光绪将“军国重要事件，仍当禀承皇太后”，应由“皇

上圣裁独断，即当重要事件，亦宜自运宸衷，无复重劳慈听”。二、要求光绪对“十年来吏治不修，军政大坏，徇府而下嗜利成风，丧廉耻者超升，守公方者屏退，治绩日进，蔽蔽日深，国用太奢，民生方蹙”等种种过失“亟图修省”、“引咎自责，特降罪己之诏”，“痛戒从前积习之非，隐励今日同仇之慨”。三、要求光绪“大奋英武”，“严明赏罚以操胜算”。对处罚过轻的依克唐阿、丁汝昌、卫汝贵，“月蒙殊待奖”的叶志超，“挟私遂非”的李鸿章，“不满人望”的李瀚章、裕宽、德馨、福润、邵应澂等”给以处置或罢归。对“十年来，军机大臣始误国家”者，予以屏斥。做到“除恶务勇，威断若神”。四、要求光绪“隆重武备以振积弱”。要添设武备学堂，开设数学、制器、测量、管驾等学科，“多聘外国教师，分门传习”，“兼募洋将训练”军队，要“重武臣之选”，“一意整顿练军”。要重视东三省的建设国防，“开办铁路、屯田诸政”、“极力经营，务成重镇”，“然后各省亦得次第而整饬之”。光第还在《条陈》的前言中分析了国际形势，认为日本和俄国“在我肘腋之下，眈眈虎视，伺隙需时，此其志亦不在小也。今事已形消长，恐我亦隐然思逞”。因此，光第要求光绪“勃然发愤，内断于心。披览史册，鉴古今之成败，周知海内，酌中外之利害。然后用开创之规模，为继述之事业”。

光第经过深思熟虑，把《条陈》写好后，曾与少数得知的朋友看过。农历六月底（公元7月底），赵煦和尹仲锡一次访问乔茂萱，恰好光第亦至，袖出其《条陈》手稿，请为共同酌定。乔大加赞扬，并提出文字

上的参考意见。赵和尹二人因系初仕后进，谈后共同称善而已。

光第把条陈折缮写好后，曾将此事告诉妻子张云仙，云仙“屡言须斟酌，不可冒进！”光第态度坚决，说：“本朝宽大，不杀言者，至凶不过出口耳。且朕条陈中措词尚颇得体，即有不测，不过革职。但得一革职，则都察院官必有愧而发愤力言者，岂非国家之福，亦即为人臣子之厚幸耶？”可是，当光第将《条陈》递给刑部堂官时，各堂官看后都突然失色，互相规谏、推委，不肯代奏。光第大为愤慨，只得向相识的几位御史说明原委，请与奏闻，可是没有一个人“肯发此难”。光第为此含血喷天，决眦切齿，叹道：“私心之胜，宁死身而不回，情面之深，虽亡国而不改。悠悠苍天，此何人哉！”不禁声泪俱下。

光第的《条陈》“虽未得上奏，而衙门中喧然传之，各省亦多传说。湖北高理臣侍御曾托光第同年王鸿南要条陈底稿来看，光第未给。“条奏既不待上，胸中勃然莫遏之气，遂乃一一发之于诗”。光第接连写了古诗数十首。

农历十月，日军攻占旅顺，进行大屠杀。京师颇为震动。京官家眷，十去其八。但是，慈禧却在大肆挥霍，为其祝寿叫奕訢，加紧乞求议和。光第指出朝廷的作法是“执事者偷目前之安，屈与讲和，不能振刷，不过图旦夕苟延，将来祸患，方未艾也”。他在痛心惊骇之后，表示“不和尚不忍去。如和了，便待明年回福建一行，然后一游东南山水，卷而怀之”。“终老田里，看迹名山”。他觉得自己抱定拯救国家危亡的大志，冒着革职充军的危险，写了《条陈》，谈了“人人所欲言而不敢言”

的“天下之公官”，大臣们连帮助传递的勇气都没有。自己身在庙堂，反而报国无门，岂不惭愧？！因此产生了弃职还乡，以文章报国的念头。

宗叔举臣六旬、叔母五旬，光第应宗弟庆堂嘱托，写了寿序。序中，对慈禧修颐和园、办大寿，提出了批评意见，而对两位长辈也“以视为颂”。这是祝颂类文章中少见的。

光第将自己写的条陈誊写了一份给庆堂，为了避免意外，他叫庆堂“不可与人看”。

这年，宋育仁被清廷任命为出使英、法、意、比四国公使的参赞（副使）。光第写诗六首送行，爱国忧时之情，溢于言表。其中一首云：“海邦玉帛久相从，忽忆当年靖海烽。白日鲸鲵愁鬼国，热河霜露泣宸宗。似闻野火延空苑，真见花旗列峻墉。不尽万方臣子恨，昆明战舰有长龙”。

写有《感怀》、《卧佛寺夜宿听人谈关外形胜》等诗，写晋大父、先太父、大母及父、母、伯、堂兄姪廷等的家传、事略数篇寄自流井刘庆堂处，转交赵化镇胞弟厚村抄写保存。

前后请赵学坪孝廉、袁廷彦郎中、高澄兰太史、李眉生廉访、刘云璈翁修等为刘庆堂书写匾、屏、对联，以祝贺宗叔举臣夫妇的寿辰。

（《与刘安怀堂手札》、《袁圣斋诗集》赵熙《香宋日记》、尹仲锡《帝京日记》）

1895年（清光绪二十一年乙未）三十六岁

农历四月廿三日得福建族中人信，邀返故乡武平祭祖。

胞弟厚村（光筑）到京读书，堂弟南村也再来京继续读书。

这年春，日军攻山东荣城、威海卫等地，北洋海军全军覆没，丁汝昌服毒身亡。“朝廷事权不一”，又派人赴日求和，国家大局“一日不如一日”。光第见此，“不免愤色自伤”、“痛哭太息”，处于去国不忍，在朝有愧的矛盾境地。这时，赵熙因守制回川，给光第来函，隐寓招隐之意。朝中一批因见时事日非，直言不用或反对和议的大臣相继告病开缺。杨锐也劝光第“君子可以去矣！”光第认为中日战争“所用之谋臣战将，虽力言战，亦必亡国”。原因是朝廷“不知用人，则和战皆自败之道”。他计划“和议如成，决当归去，不忍涕泪无耻，冀冀而立于相忍之朝”，“俟下半年起行。且须回闽订一行，便看东南山水，访识其高人逸士，然后拂衣考卜，憩足林泉，长为农圃野人以终”。

光第在杨锐处见到沙国的议和条款后批评道：“奈当事诸人急于议和，只图苟安旦夕！”他“每对人言，数年以来，穷也穷不死人，惟去年以来，所见所闻之事，真是要气坏人！愁死人也！”

八月，生子鹤年。

八月，光第告假南游。计划由浙闽入粤，往两湖，再泛长江由沪从海道经天津返京，为期一年。他从天津乘轮泛海过沪。经杭州游西湖，写《瓢湖》诗在书肆买《浙东翁诗集》，题诗云：“二樊（樊川、樊南）忘爱有遗篇，逸气闲情读所宣。暗宋风骚犹此老，少陵衣钵各真传。苦悲词马忧王室，闲倚黄牛学地仙。今日钱塘开互市，鉴湖行亦叹腥膻”。

湘坑湖，是光第祖籍所在地，位于福建省汀州武平县东北百十里，北去长汀县百二十里，西去会昌县百二十里，西北去瑞金县百四十里。是高山中的一个平坝，四周有大小村落三十个，田畴万石，有刘氏宗族四百余家。光第从福州登岸再到湘坑湖。受到七十七岁的长辈刘庆芳、刘廷珍、族弟刘刚甫为首的宗亲们的热情接待，几乎轮流邀饭，庆芳翁更是天天相见，引光第登高拂荆，往探崎嶇地祖墓。有一天，湘坑湖外有几个农民听光第讲中日和战故事，都搔首太息咨嗟，一会儿，突然问我：“扶朝军师现在是谁？”意思说应该有如姜尚、诸葛亮一流的人，为什么反被日本欺侮、打败了。光第不禁感慨万分，写诗道：“扶朝军师今是谁？此言堪笑亦堪悲。也知画策臣须急，一犁田间作水儿（~~原注~~：该乡谓伐木为作山，耕田为作水）。在湘坑湖，光第与族亲们谈蜀两族往事，续族谱，过得很愉快，但是当他一想到国事日非，外寇侵略时就忧从中来，甚至流泪。他写《雨来》诗云：“雨来犹作故乡看，暂到湘湖意已欢。邱垅四朝身尽拜，松松千尺祖曾攀。逢人竞说~~流~~地，~~蜀~~我承家~~獬~~鹿冠。忽忆海疆新割去，愁时不觉涕~~流~~湖。（原注：獬~~狴~~地，明金事公墓在焉）

与湘坑湖的族亲，相聚四个月后，转道福州乘鲤门轮赴广州。船经香港，正是夜间，光第凭栏眺望这块割让给英国已五十年的国土，思绪万千。写诗抒怀道：“冰碧山青画不如，楼台尽是岛人居。依依三十年前月，曾照华民采夜鱼”。

光第到达广州，寄住在广州知府、四川同乡、癸未同年蒋达宣署中，

蒋达宣、紫瑞兄弟伴游粤秀山、观海幢寺。在武平白云山，有赖义士墓。赖是明末清初人。当清军入关勒令汉人剃发结辫，不从者杀时，赖义士偕冠儒服，“誓将戴发黄泉没”。光第专程上山吊赖义士墓，追怀他的高尚气节。並在古诗中赞道：“杀身成仁心所安，析义要如筋入骨。苏卿嚼毛不忘汉，大节文身为游越”。

年底前，光第又往游罗浮山，盘桓了好几天。寄宿黄龙观，冲虚观，观山赏瀑，为华南的奇异风景所感，写了十余首诗。游惠州，访东坡遗迹，吊朝云墓，都写了诗。

在广州期间，光第还谒见了壬午年四川乡试的副主考、现任两广总督张安圃（人骏），纵谈时事，希望这位“恩师”对朝政有所贡献。

（《与刘安怀堂手札》，刘黎述《蜀秀》《哀圣斋诗集》）

1896年（清光绪二十二年丙申）三十七岁

春、夏，光第离广州北上，越大庾岭入江西，经南康等地到达九江，登庐山，再西溯武汉，复乘江轮东下到上海，“泻泄数日，幸医愈”，“直到六月初六日始行旋京。此行“游览山水，略消愤懑”。在南康，应四川同乡王太守邀请游湖。到九江，登庐山，为了探幽采胜，“独持雨盖腊屐，怀饼饵，往至山颠，见虎食人，血肉狼籍。冥夕避雨宿古寺。明日得一牧竖导之，乃归”。“在武昌，与张香涛（之洞）制府痛谈时事”。张在全国和四川士大夫中颇有声望，但这次会晤，光第颇为失望，他的印象是张对重大问题唯唯诺诺，不置可否，或者模棱两可，难于捉摸。“谈论间，不见张有忧危国命的气象”。光第暗自评论：“断断操持，苟全性命，多

深的嫉妒！”

此次返福建访祖探亲，还从族中带回两个贫苦孩子到京，“拟教之认字学书，以为将来生计”。堂弟刚甫也来京，于光第家就谈，“人口愈多，缴用更大”了。

夏四月，李鸿章在莫斯科签订《中俄密约》，俄国攫取了建筑东清铁路特权，逐步控制东三省。德、法两国亦相继要求割占土地，要清廷作为俄、德、法三国调停日本退还遼南的酬谢。光第对“朝中二三大臣敢为秘密，亦无人肯力争者”深为痛恨。叹道：“不图史册所载亡国奸庸，为平时读书所切齿痛恨者，至今日而亲见之”。因为“大局尚未见有振作，外国愈见逼”，光第“无一日不忧来填膺”、以致“积忧成愤，遂使精神易忽”。他认为“今日事势，比中日未战之前尤为可怕。为人上者愈纵酷虐，而权要之途，愈贫愈鄙”，“忧危之候俱在下位，而居高位者咸非其人”，至为可虑。光第在此时期，更加注意学习，在思想上有了新的变化：一是对君权制的看法动摇，主张采用议院制。他说：“现在归公办理之事，毫不认真，此中国君权不行之故；未能如外国参用民政议院便好”。要求清廷“仿照外国参照民权之法”。二是对梁启超任主笔的《时务报》给予高度评价。他“与星谭、芸子信，劝其将报广为流通，以开固陋，俾吾川士商周知中外时务”。农历八月二十日，他又函告宗弟庆堂：“取一份来看，并可劝亲友等多看之”。他还说：“此馆系梁卓如执笔，其人古文好，又周知外国情形，所登译外国报亦翔实，不比申报馆及京中官书局多有谎报”。並將该报“将来必多迎品，

必能力崇实学，成就人材，蔚为时用，此于世道大有关系”。光第还怕引不起刘庆堂的重视，特别把“成都、重庆俱有分局派报”的详细地点，每月几本、每本价目，都一一告诉，最后又再囑咐庆堂：“惟吾弟留心焉”。三是注意开发矿产，发展商业。这年三月，宋育仁被派回四川办理商务、矿务，光第对此十分关心。他于六月四七日写信给刘庆堂探询宋育仁工作进展情况，并说：“惜兄与芸子在海中错过，未得晤谈为快”。十二月廿日，他又在给庆堂的信中谈到四川总督鹿传霖与宋育仁意见不洽，支持不力，担心宋的商务发展计划是否能够实现。他对宋将集资招股造洋腊一事很赞同，在给楚枏大令的赠诗中有句云：“若把通商讥逐末，国家安得南北洋？宋家新法研红襖，与君同抱光明志”。四是辞官返家的计划有了改变，决心参加救亡图存。他说：“中国此时是一烂局，将来如有变乱，岂只京官受困耶？将皇舆中三万万数千百万生灵，均有一不堪设想者。天乎！人乎！岂可听之而不念乎！豪杰之士何以自立乎？”

因为家中人口增多，又在京城丰宜门外租废园，有茅屋数间，围以竹篱作为家塾，聘请从赵化镇来京赴试不第的亲戚廖蕴颐作教师。有时同乡举人入京者也下榻其中，光第公余之暇亦来园中，“躬耕课子。二三友人过访，则沽白酒，煮芋爰饕客。篱外柳下涌泉如珠，太常仙蝶亦翩跹至，友人咸以为奇”。光第却不以为然，“慨然曰：‘天下如此，我辈安得修符瑞自雄哉！’”写有《京寓》、《京寓小园》等诗，描写其“残蔬雨过还新绿，老树春迟待久花”的景致和“半间斗室洒良友，三尺书床课小男”的生活情趣。

冬，胞弟厚村不听光第劝阻，坚决返回赵化镇。光第写有《厚村还蜀作诗四首送之》。

（《与刘安怀堂手札》、《衷圣斋诗集》、高楷《刘光第传》

刘聚述《蜀秀》）

1897年（清光绪二十三年丁酉）三十八岁

四川自去年受洪灾、地震后，饥民遍野。光第和同乡京官听到“饥民多全家饿死者”的消息后，共同“力筹捐集”，先后筹集了约一万二千金，并向各省京官题捐，更发信给在各省作官的四川人，劝他们量力捐助，同时上奏皇上，又批准二十万银两给四川赈救灾民。三月二十二日，光第和“同乡京官共善县公折，前往乾清门外行礼谢恩”。事后，光第写信告诉刘庆堂说：“川省人口之多甲于天下省分，平时都无盖藏储蓄，一旦遇有天灾，流离死亡，灾害立至，此中宜如何补救之法，作官者既概置不管，则惟有世道之忧者自警警人，相与筹为保卫周防之道而已。即以谷米一宗而论，总宜劝富者多积谷，少积银钱，以为凶年发赈平糶及兵年守御之用，即有天灾告警，便当刻刻留神”。指出了四川自然灾害造成恶果的原因是一、人口多，二、平时没有储备粮食，三是当官者没有救灾措施。同时也提出了救灾办法，就是要一、藏粮于民，多积谷，少积钱；二、灾年发赈、平糶；三、一遇天灾苗头就要警惕。

这年，“国家上下安谧，较前愈甚，奸贪无耻，举国皆迷”。各衙门的贪官污吏串通太监，怂恿慈禧在颐和园天天唱戏，举办庆寿典礼，不以国事为念。直到德国借口“巨野教案”，派舰强占胶州湾，各国

~10~

瓜分中国之势，“军机大臣、总理大臣等始皆面面相觑，束手无策，坐待分裂而已”。光第对此十分急愤，认为要改变这种危机，“下手工夫，总在皇上一人为要，必须力除谄谀蒙蔽，另行换一班人从新整顿，始有起色转机”。因为这种意见无法奏闻皇上，他常常切齿握拳，含泪长叹。听说刑部主事吴炳生、工部主事康有为曾上条陈，恰好杨锐也写了一个奏折，找光第研究。光第就把自己甲午年提出的救国图强主张和杨锐的主张融合一起，准备通过徐桐转奏。

八月，湖广总督张之洞六十生日，四川京官因感谢他热心帮助赈捐救济川东灾民，加以他曾任四川学政，兴办尊经书院，培育四川人才。尊经书院出身的京官们作了一架寿屏，由杨锐撰一篇骈文致贺。曾出张之洞门下而在京外作官的四川同乡，另外作了一架寿屏，请光第撰文祝寿。光第对张之洞的为人，在去年南游时曾有所了解而失望，但他在对法战争中表现刚强，在当时的封疆大吏中，确是赢得朝野的称誉。有鉴于此，光第在文章中就提出了希望他作“忠谏之士、为画策臣，可谋远猷，用以延我圣清之命”的意见，同时又知道张“颇有自是之心”，“又以卫武公能文章，听规戒为况”，希望他能改正缺点。

这年，北京周围地区遭灾歉收，米麦大涨。光第家中常“买包谷小米面（杂黄面）及菽薯贴米而食”，还在园中自己锄地种了葫芦、豇豆、绿豆、豌豆等蔬菜。

原富顺知县王晋卿因私德被人参革去职，后由甘肃奏保开复留甘补用，来京引见。他仰慕光第和杨锐，分别造访，与光第“谈议甚洽”。

王后来任新疆布政使。

甘肃提督董福祥向朝中大臣行贿，在京公然索要陕西、新疆巡抚。
“恭王则隔数日必交三百万金与其门上家人，嘱其置地”。光第闻而叹道：“无相无将，并无人心，此祸不知何日发作？此事不知何日收拾？徒令袖手无权者吞声忍气，闭气坠心已耳！”

德国和俄国先后侵占胶州湾、旅顺、大连后，朝中王公大臣恐大小官吏得知，“特严飭小军机等，如有漏泄，惟其是问”。使所有想议论上奏的人都无法知道详情。光第认为这种作法正与外国大事众议相反，亦与我古人询谋佥同之意不合”。他愤斥道：“天生此等亡国之人，真诗人所谓‘自有肺肠’者也！”

赵熙弟子、浙江诸暨人周孝怀来京，与光第论说古今，所见略同。光第见其青年博学有识，约周于明年来京教子读书，周当即答应。

四川同乡乔树枬原曾列名上海强学会，他介绍梁启超与光第相识，“然衰村之在京师，闭门谢客，故过从希焉。”但光第对梁启超的议论文章却很赞许。本年三月，光第曾再次向宗弟庆堂推荐《商务报》说：“此必当读之书也！”

这年写有关于《毛诗》、《杜诗》、《史记》等的评议文章和诗篇，他在《京师蔬菜有最美者漫赋》诗中还慨叹道：“饱食长祝太平年，不识国危吁可怜。草根树皮食已绝，故里哀鸿眼流血！”

（《与刘安怀堂手札》，《袁圣斋诗集》梁启超《刘光第传》，汤志钧《戊戌变法史》、刘絮述《蜀秀》）

伟大的统战风格

——忆周恩来同志与青年党领袖曾琦一席谈

张肩重

一九三九年春，抗日战争进入第三年。时武汉、广州两市先后沦陷，又在长沙大火之后，国民党内部分裂，汪精卫、陈公博之流，纷纷私逃河内，公开叛国投敌。抗战阵营出现了异常混乱和紧张的局面。当时，陪都重庆及后方各地，人心惶惶，谣言蜂起，大局岌岌不安。笔者刚从桂林回到重庆，特往市区下半城东林煤矿公司（此系青年党人刘涸英主办的）探视青年党领袖曾琦先生。这家公司地址简陋，过道敞厅即作为会客地址。当笔者踏上十多级道入门时，看见周恩来副部长（时周恩来同志任政治部副部长）正与曾琦先生并坐叙谈。周公（时人对周恩来同志的尊称，下同）一见笔者就说：“原来你和慕韩（曾琦名）先生也是熟人”笔者就说：“曾老先生是我母族的长亲”。周公又问：“你也是隆昌人”笔者说：“我是富顺人，与隆昌是邻县”。周公说：“我来是向慕韩先生请教，并交换对当前抗战大局的看法和意见的。现在请慕韩先生谈吧！”曾琦先生沉默一下后说：“我们对抗战大局还是很乐观的。古语说：‘一成可以兴复’何况我们还有半壁河山，如川、粤、桂、湘、鄂、滇、黔各省连成一片，是完全可以打破日寇侵略我国的企图的。”周公马上插话说：“现在不仅有西南各省，我们还有陕甘宁边区政府领导下广大西北地区以及青海、新疆等省，合并起来，占全国领土一半以上。从国

家领土上讲，抗日战争的胜利，是毫无疑问的。现在关键问题是：全民族和各党派的团结一致，才是一支坚不可摧的战斗力量”。曾琦先生立即答复说：“我们青年党人，就是由一批爱国志士组成的。同是炎黄子孙，我们是特别重视民族团结的”。周公很高兴地说：“这点是非常重要的，这就很好嘛！！”

周公这时转向笔者说：“你们青年人，对于当前的局势，有什么想法和看法？”

笔者立即答复说：“我们对于持久抗战的信念（周恩来同志曾于上年在长沙、衡阳两次宣讲过（《毛主席论持久战》）还是坚信不移的。不过，大家对于什么叫‘抗战到底’问题上，发生有不同的意见。有的人说：抗战恢复到卢沟桥事变以前的状态，就是说抗日战争恢复到七七事变以前的情况，就是抗战到底了。但绝大多数人都坚持不同意见，认为抗战到底一定要恢复到‘九一八’以前的状况，才算到底。前者说：抗战是从七七事变开始的，能够恢复到那时的状况，就算抗战胜利了！后者坚持说：日寇侵略我们，是从‘九一八’侵占我东北三省开始的。保家卫国，必须打到恢复东北，才算抗战胜利，才算抗战到底！两者都各说各的道理，应该怎样认识才算完全正确呢？”周公立即问曾琦问道：“慕韩先生的看法怎样呢？”曾琦答复说：“我们主张恢复国家的领土主权是主要的”。他未说明前面两说以何者为更正确。同时反问周公说：“你们共产党人又主张如何呢？”周公说：“我们共产党人的主张，一贯是坚定而明确的。抗战到底，就是一定要把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，

完全迁出中国领土，使中华民族能够摆脱帝国主义势力的压迫和奴役。完全独立自由才行。慕韩先生前年（指一九三七年）冬天，不是写过一篇‘抗日必胜论’的文章，还刊在新华日报上吗！”曾琦很愉快的说：“我们两党对于抗日形势的理解和看法，是完全一致的”。

.....

回忆三则

.....

杨汝纶

一、与于右老一面之缘

抗日战争前，我在南京金陵大学附中读初中时，同学中有不少人喜欢从街上的一些匾额上去摹仿于右任的书法，特别喜欢学他的签名。在画报上，我也常常见到于右老飘逸的美髯和布衣布袜布鞋的魁梧朴素的形象。

抗日战争胜利后，我在一个经济部门当职员，经过金大附中的同班同学张澄基介绍，认识了于右老的女儿子慈慈。有一天，他们两人邀我到他家便餐。那时于右老住在南京宁夏路。我心里想，于右老是国民政府的监察院长，一个“小人物”去见一个“大人物”，可能会受到冷遇，心里有些踌躇。但是经不住于右老女儿的一再邀请，我终于硬着头皮去了。那天于右老正在聚中，当于慈慈把我介绍给这位“大人物”时，出乎意料的是这位“大人物”爽朗的笑声，仍旧是布衣、布鞋、布袜，长长的美髯，神采奕奕的眼神，朴实的语言，一点官架子也没有。离开他家时，他还送我到门口，伸出粗大的手和我握别。

这一次我带了一本大型纪念册，请他题了字。以后，我的伯父得知此事，还要我托于慈慈，请她父亲于右老写一副条幅。于右老很快就写好转交给我。

~16~